

语言学研究

非洲现代文学的语言论争^{*}

——兼论非洲本土语言文学价值的反思与重构

孙晓萌 胡 燕

【摘要】非洲文学创作中的语言问题长期悬而未决，系源自于欧洲殖民者在直接或间接统治过程中实行的差异化语言政策。非洲本土语言文学的产生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殖民当局制定的语言与文化政策，以及殖民代理机构的介入性影响。后殖民理论回避本土语言文学，使其在现代文学批评话语中未能获得应有的合法地位，但非洲语言与文学内在的政治属性为包括本土语言作家在内的非洲作家开启了颠覆殖民权力与权威的可能性。本文拟论证非洲现代文学之生成，是非洲的本土语言文学与使用西方语言书写的文学在后殖民语境中相互激荡影响、相互补充渗透的结果；在非洲的“去殖民化”进程中，二者共同作为积极的政治性因素，参与了重构非洲身份与主体性的集体表述。

【关键词】本土语言文学 语言问题 殖民主义 “去殖民化”

【作者简介】孙晓萌，北京外国语大学非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胡燕，北京外国语大学非洲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20)02—0107—11

黑格尔在其著述《历史哲学》中曾公然将黑非洲排斥在世界历史之外，并断言非洲本土不存在任何文明，对世界文明没有任何贡献。^①这种认识论上的偏见在很长一段时间几乎影响到涉及非洲大陆的全部学科知识体系。非洲文学研究中的本土语言文学常被冠以传统、口头、地方性、同质性等特征，与使用西方语言书写的非洲文学的现代、书面、世界性、异质性形成鲜明的二元对立范式，因此“口头性”特点明显的非洲文学很难纳入文学研究学者的视野，反而常被作为社会人类学的原始材料使用；抑或直接将非洲语言书写的文学作为使用欧洲语言书写的非洲文学的口头素材来源。直到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广泛的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系统化的非洲文学研究得以开展。而毋庸置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英国殖民时期非洲豪萨语和斯瓦希里语本土文学嬗变研究（1900—1960）”（16BWW085）、北京外国语大学青年创新团队项目“非洲文学批评研究”（2019JT002）的阶段性成果。

① Georg W. E. Hegel,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rans. J. Sibree, Kitchener: Batoche Books, 2001, p. 117.

疑的是，非洲文学自身发展演变过程也受到诸多因素的介入性影响，尤其是伊斯兰教的传播和欧洲殖民入侵等。所谓后殖民理论，就是以非洲和其他前英、法殖民地的使用欧洲语言为媒介创作出的作品为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后殖民研究规避使用本土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如此厚此薄彼，有意无意间产生了这样一种认识，即非洲现代文学始于使用西方语言创作的非洲文学。但是，历史的真相并非全然如此。相反，被后殖民批评理论忽略的，是英国对第三世界采取间接统治的历史，在这种统治方式下，恰恰鼓励和嘉奖非洲本土语言的文学创作。因此，非洲第一批现代文学作品不是用英语或法语创作出来的，而是使用本土语言创作的，而这种使用本土语言书写的才是非洲现代文学的起源，至少是诸多起源中的重要一支。本文拟从非洲现代文学中的语言问题切入，对本土语言在非洲现代文学中的合法地位作正本清源式的追溯，爬梳非洲现代文学中的语言之争，试图拆解长久以来在后殖民批评话语中建构的非洲本土语言文学与使用西方语言书写的非洲文学之间的对立结构，以及隐含于其中的权力关系，认为二者之间形成互补，交互影响，同为非洲现代文学的组分，共同参与了非洲的“去殖民化”进程。

一、非洲现代文学中“语言”的问题化与论争

语言扮演着承载和传播各民族或族体文化、思想、道德等观念的角色，其合法地位往往毋庸置疑；作家选用何种语言创作，往往与其个人或民族身份认同相符，极少受到批评家们的质疑。但在非洲文学，尤其是非洲现代文学中，语言却常常被问题化。英语、法语等帝国的语言作为殖民主义遗产，在大多数非洲国家独立后继续作为其日常生活、官方和写作用语，一些主张使用本土语言的作家遂对外来语言在非洲文学中的主导地位产生质疑。随着语言的问题化，非洲现代文学的定义也一度引发争议，即是否只有用本土语言创作的文学才可归为非洲文学范畴？20世纪90年代，后殖民理论异军突起，成为批评家们用于批评第三世界英语文学的有力工具，使用西方语言书写的文学获得了理论依据，但语言问题论争并未就此终结，后殖民批评事实上加剧了本土语言与文学的边缘化。

语言之争肇始于殖民时期对本土语言写作的呼吁，但真正形成话语场域，却是在后殖民时期非洲作家建构非洲现代文学身份的过程中。1962年，在乌干达马凯雷雷大学（Makerere University）举办的“非洲英语作家大会”（A Conference of African Writers of English Expression），以非洲语言的阙如拉开帷幕，然而讽刺且吊诡的是，在这样一个斯瓦希里语作家夏班·罗伯特（Shabaan Robert）、约鲁巴语作家D.O. 法贡瓦（D. O. Fagunwa）等本土语言重要作家缺席的会议上，第一项议题讨论的竟然是非洲文学的定义！这种最初就将非洲语言作家与作品排除在外的做法，显然没有减弱与会学者对于语言问题的关注。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非洲语言是评判非洲文学的标准吗？阿拉伯语算什么，对非洲而言难道不是外语？已经成为非洲语言的英语和法语算什么？^①

继马凯雷雷会议之后，当时尼日利亚的一名留美学生奥比·瓦里（Obiajunwa Wali），于次年在《变迁》（Transition）杂志上发表题为《非洲文学的穷途末路》的文章并直陈，“不加批判的完全接受英语和法语作为非洲知识分子必要的书写媒介，这个方向是完全错误的，绝不可能推进非洲文学和文化的发展；除非非洲作家承认，真正的非洲文学必须用非洲语言书写，否则，只会走进一条死胡同……”。^②时至今日，瓦里关于“死胡同”的预言并未应验，但正是他对非洲的英语、法语文学

^① Ngũgĩ wa Thiong'o, *Decolonising the Mi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African Literature*, Harare: Zimbabwe Publishing House, 1994, p. 6.

^② Obiajunwa Wali, "The Dead End of African Literature," *Transition*, Vol. 3 (10), 1963, pp. 13—15.

之压倒性优势的忧惧与直言，引发了非洲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对语言问题的空前热议。未久举行的旨在讨论非洲文学和大学课程的弗拉湾会议（Fourah Bay Conference），以及此后关于非洲文学语言问题的持久论争，即是瓦里此举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实证。这场论争中最引人关注的是钦努瓦·阿契贝（Chinua Achebe）和恩古吉·瓦·提安哥（Ngũgĩ wa Thiong'o）二人的话语交锋。

1965年，阿契贝在《变迁》杂志上发表《英语和非洲作家》回应瓦里的指责。阿契贝在文中表示，“我觉得英语将能够承载我的非洲经验。但它必须是一种新英语，仍与非洲的祖先保持充分交流，但更能适应新的非洲环境。”^①通过将伊博语中的谚语、习语、句法和词汇结构融入英语文本，阿契贝成功地实现了“新英语”的转化，使英语在与非洲语言文化的对话中呈现明显的非洲色彩。非洲大陆上使用的欧洲语言是殖民主义的历史产物，英语等欧洲语言成为文学的书写媒介具有历史必然性，但是，英语作为一门世界通用语的代价是，在各国社会语境的使用中处于被改写和挪用的位置，受使用主体的支配，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使用者，为其传达信息，甚至为其取得挑战（新）殖民权力的效果。

马克思主义左派作家恩古吉是所有非洲作家之中，在语言问题上用力最甚者。他虽然早期使用殖民语言进行创作，但认为非洲文学应该用非洲语言创作、以非洲生活为题材，而用西方语言书写的文学属于非一欧文学传统（Afro-European literary tradition），实为欧洲语言文学的附庸。^②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也是价值的载体，因而在恩古吉反对欧洲价值体系的“去殖民化”策略中，就包括弃用英语。早在1967年就表示不会继续用英语写作，1975年他明确表达要用本族语言——基库尤语（Kikuyu）写作，并于1977年与人合作首次写成本土语言戏剧《我要在想结婚时结婚》（*I Will Marry When I Want*）。此后的小说《十字架上的魔鬼》（*Caitaani Mutharaba-Ini*）、《马提加里》（*Matigari ma Njiruungi*）、《乌鸦奇才》（*Mūrogī wa Kagogo*）均用本土语言写成，后译为英语。恩古吉的语言观源于殖民时期的个人经历，殖民当局在肯尼亚实施的选择性教育（selective education）方案，通过各种手段压制本土语言，赋予英语在教育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导致本土人形成非洲语言文化低劣的认知。这种受压迫的心理使他产生激进的抵抗情绪。他后来的语言转向虽在具体创作与本土语言运用中遭遇困难，仍获得显见的攻击新殖民主义的效果，显示了本土语言所蕴藏的巨大颠覆潜力。他使用本土语言创作的小说，直接与民族群众接触，其启迪激励功用之大足以形成一股群众性的革命力量，并直接威胁政府统治的基石。但值得一提的是，恩古吉大力主张并身体力行使用本土语言进行创作，系出于对欧洲语言文学及其依附的帝国权力的全力抵制与否定，这种实践导向一种明显的、非一欧文化的对立。正如阿契贝后来总结自己与恩古吉在语言问题上的分歧时所言，“恩古吉认为这是非此即彼（either/or）的问题，而我则认为二者兼容并存（both）”。^③

阿契贝和恩古吉代表的两种观点分别受到不同学者的支持及反对。事实上这场持续数十年之久的论争直到20世纪80～90年代演进得最为激烈。《非洲文学研究》（*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杂志于1992年推出春季特刊，专事讨论语言问题，大体形成语言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

^① Chinua Achebe, English and the African Writer, *Transition*, No. 75/76, 1997, pp. 342—349.

^② Ngũgĩ wa Thiong'o, *The Language of African Literature, Decolonising the Mi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African Literature*, Harare: Zimbabwe Publishing House, 1994, pp. 4—33.

^③ 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Essay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9, p. 97. 转引自姚峰：《阿契贝与非洲文学中的语言论争》，《外国文学》2014年第1期，第69～80、158页。

两种对峙观点。^①语言相对主义观点源于“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一个人的思维完全由母语决定，因为一个人只能根据其母语中编码设定的范畴和区别来认识世界。其支持者极力主张使用非洲语言书写，以捍卫非洲本土语言的正统性和合法性。语言普遍主义则承袭了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学说，认为在非洲大陆上通行的英语本身就是一门非洲语言，因此使用英语书写的文学理应属于非洲文学的范畴。

二、“语言”对立的消解

非洲文学中的语言论争看似形成对立的两派观点，但实际情况更为复杂。这种复杂性与非洲社会的内在多样性及殖民统治相关。首先，非洲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形成不同的方言区域，产生了多样化的文明，由于地缘等因素，各文明之间并无“太过亲密和长期的联系”。^②1884年柏林会议，欧洲列强把一个有着众多民族、文化和语言的大陆分割为不同宗主国的势力范围，构成了非洲现代国家版图的雏形。这种分割方式同时也定义了非洲的语言和文学版图。迄今为止，在对非洲大陆版图进行划分时，前殖民宗主国语言依旧作为界定的标准之一，如英语非洲（Anglophone Africa）、法语非洲（Francophone Africa）和葡语非洲（Lusophone Africa）。其次，各殖民宗主国确立殖民统治体系之后，并未以摧毁非洲语言、确立欧洲语言的霸权地位为目的，统一实行单一的语言政策，而是依据各自的利益关切与意识形态实施差异化语言政策。法属地区以追求语言文化同化为目标，在殖民地全面推广更“先进”的法语；在德属东非，班图人被剥夺一切可能接触殖民宗主国语言的机会，斯瓦希里语因此得以发展；南非引入“班图教育法案”（Bantu Education Act），严格规定非洲人只能使用本土语言。不止于此，同一殖民势力范围内，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分歧亦导致差异化的语言政策。在比属刚果，说法语的比利时人主张同化推行法语，而说弗莱芒语的传教士则主张发展本土语言。英属非洲的语言政策遵循“分而治之”的统治理念，同时又受三股殖民力量的影响。基督教传教士认为，要皈依非洲人使其“文明化”，需用本土语言与其进行精神交流；殖民政府的“间接统治”利用既有的社会制度与治理结构，以尊重传统文化为遮蔽，鼓励本土语言的发展，并对原本发展程度不同的诸多地方语言进行差别对待；同时为了保障统治机器有效运转，殖民当局制定教育政策，教授非洲人英语、基督教教义和英国社会的价值观，培养效忠于帝国的少数中间阶层；而英国定居者惧怕非洲人因“西化”变成“文明人”，不再甘心做顺从雇工，因而极力推崇发展本土语言。而在莫桑比克则推行一种准一同化主义语言政策（quasi-assimilationist policy），殖民当局在推行葡萄牙语的同时，相信使用本土语言才可确保向受殖者表达权威，因而当战争爆发时，当局认为有必要用非洲语言进行广播。^③

殖民时期如此复杂差异的语言政策，导致非洲人对宗主国语言及自身语言的认同存在巨大差异。坚持用祖鲁语写作的玛兹斯·库内内（Mazisi Kunene）认为，宗主国语言在殖民政策的规划下显示出与殖民权力相伴生的权威性，并渐渐为被殖者接受；它塑造了被殖者的思维，使其接受伴随语言的西方价值与思维方式。^④使用殖民宗主国的语言进行创作，会对本土语言文学的合法性造成直接威

^① Alamin Mazrui, Relativism, Universalism, and the Language of African Literature,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Vol. 23 (1), 1992, pp. 65—72.

^② Albert S. Gerard, *Four African Literatures: Xhosa, Sotho, Zulu, Amhari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1, p. 13.

^③ Alamin Mazrui, Relativism, Universalism, and the Language of African Literature,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Vol. 23 (1), 1992, pp. 65—72.

^④ Mazisi Kunene, Problems in African Literature,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Vol. 23 (1), 1992, pp. 27—44.

胁，进而对新生国家的国家民族建构构成危害。独立后，尽管非洲国家实现了主权方面的独立，但是在经济、文化与政治上，基本因袭殖民母国的建制。后殖民时期的社会—政治结构给予欧洲语言更强大的制度支持，西方语言与现代化的发展似乎形成更紧密的联系，对非洲人而言也似乎更有吸引力，从而使本土语言显得更“落后”。与西方—本土语言相对应形成了先进—落后的观念。艾泽基尔·姆法赫雷雷（Ezekiel Mphahlele）就认为，在非洲现代文学创作中使用本土语言为时尚早，为满足系统性、分析性的现代思维要求，本土语言的发展尚需时日，而由于作家的创作本能与冲动先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非洲作家需要使用他们已经掌握的英、法、葡语进行创作。^① 换言之，如果非洲作家坚持使用处于“落后”水平的本土语言进行书写，将使非洲文学陷入“不发达”（underdevelopment）状态。如果说艾泽基尔·姆法赫雷雷的观点带上了普遍主义语言观所裹挟的、较为明显的等级色彩，那么阿契贝对英语语言的观点则更具颠覆意味。阿契贝主张使用“新英语”进行创作的同时，并不排除其他非洲作家使用本土语言书写。他提出“国家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与“民族文学”（Ethnic Literature）概念，^② 用本土语言书写的文学均为民族文学，它们与用欧洲语言写成的各国国家文学共同构成非洲文学的整体。

然而，阿契贝的“民族”（ethnic）概念在加布里奥·卢胡姆毕卡（Gabrial Ruhumbika）看来是极为有害的，因为“民族语言”的概念将新生的、政治上尚未成熟的非洲分裂为众多的民族、种族，无益于国家统一与团结。加布里奥·卢胡姆毕卡提醒道：“只要我们还将前殖民主子的语言作为非洲国家的国家语言，那么，非洲民族国家的团结与文化发展必然只是幻想。”^③ 他倡导发展非洲民族语言，认为非洲的民族语言只能来自部落（tribe），非洲语言问题的解决之道应是：在非洲众多现存的通用语言当中选出一门作为民族语言，其中斯瓦希里语成为首选；对于某些尚未发展出书面语言的国家，应做出政治决策，从口语发展出书面语言，以适应科学、经济、教育等现代国家发展的需求；本土语言与文学的繁荣将带来文学与社会发展，反过来又将刺激语言的发展，促进国民识字，将方言转变为足以承载现代知识的语言。^④

非洲如需保持民族—国家的独立统一身份和形式，必定需要一门共同语言以实现众多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但从现有的非洲语言中挑选一门本土语言作为通用语是否可行，是值得商榷的。殖民主义及其历史语境决定了欧洲语言在大多数非洲国家作为书写语言的地位。如若选择一门现存的本土通用语取代英语，实现起来有相当的难度。就语言作为沟通手段的本质而言，让一个族体接受另一个族体的语言作为通用语，与使用现存的、大部分非洲人共同言说的欧洲语言并无二致。一门处于宰制地位的本土语言仍会在非洲社会中产生语言的等级结构分划。钦维祖（Chinweizu O. Jemie）不得不无奈地表示，在理想状态下，非洲文学应该使用非洲语言书写，但历史境况迫使非洲人使用非本土语言作为官方语言，并用于书写。^⑤ 而这也是阿契贝及其支持者接受殖民者的语言作为交流和书写媒介的实用目的之一，他表示，如果尼日利亚仍想要以一个国家的形式存在，只能通过英语这个外来语言；并且，非洲人并非受宗主国强制而学习殖民者语言，“我们选择学习他们的语言，不是

① Ezekiel Mphahlele, Polemics: The Dead End of African Literature, *Transition*, Vol. 3 (11), 1963, pp. 7—9.

② Chinua Achebe, English and the African Writer, *Transition*, No. 75/76, 1997, pp. 342—349.

③ Gabriel Ruhumbika, The African-Language Policy of Development: African National Languages,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Vol. 23 (1), 1992, pp. 73—82.

④ Gabriel Ruhumbika, The African-Language Policy of Development: African National Languages,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Vol. 23 (1), 1992, pp. 73—82.

⑤ Chinweizu Onwuchekwa Jemie and Ihechukwu Madubuike, Towards the Decolonization of African Literature, *Transition*, No. 48, 1975, pp. 29—37, 54, 56—57.

因为他们想要我们学，而是因为在沉默地接受了殖民主义给我们划分的国籍后，我们需要它的语言办理事务，包括在时机成熟之时推翻殖民主义。”^① 阿契贝的语言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英语作为解构殖民霸权的革命性潜力。

如此看来，在非洲作家的语言实践中，欧洲语言与本土语言、相对主义与普遍主义看似对立的结构并非一种绝对。至少，持不同主张的非洲作家有一个共同的努力方向，即反对殖民主义霸权，推动语言与文学的“去殖民化”进程，争取非洲及其文学的主体地位。阿拉明·马兹鲁依（Alamin Mazrui）指出，语言先验地形成了人的认知，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尽管有显见的不相容性，但二者均为这一假设的不同维度，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反对20世纪前具有欧洲中心主义倾向的语言理论及其内在的种族主义假设，并重视人的尊严。他还指出，对非洲经验而言，两种假说互补地推动了非洲的政治议题。^②

事实上许多使用欧洲语言创作的作家，如阿契贝、奥基博（Christopher Okigbo）、图图奥拉（Amos Tutuola）、索因卡（Wole Soyinka）等人的实际创作亦表明，用欧洲语言写成的非洲文学与用本土语言写成的非洲文学，相互裹挟，互为生成，共同再现了非洲经验。正如学者指出：“非洲语言书写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现象；它存在于英语非洲文学和法语非洲文学文本的互文关系中，并提供了一个审视后二者的极具启发性的视角”。^③ 任何文本都具有开放性，因而并非自足存在的个体，总是与外界进行对话交流，一切文本与其他文本、主体以及社会历史现实之间存在相互关联与转化关系。对非洲本土语言文学和用西方语言书写的文学进行互文阅读有效地消解了二者之间的对立，同时为重塑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效手段。因此，丹尼尔·P. 库内内（Daniel P. Kunene）作出如下预判是极有道理的：

在非洲大陆上有两种文学流派，即欧洲语言文学（“非洲”文学）和遍布于非洲大陆的数百种本土语言文学。这意味着，一些非洲作家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用母语以外的语言写作，尤其是用欧洲语言。然而……有一些非洲作家现在正在用他们自己的母语写作，将来也会继续用母语写作。而且，最重要的是，非洲的说书人使用他们自己的非洲语言过去讲过、现在正在讲、将来也会继续讲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传说，他们的神话，他们的史诗。非洲文学研究不能只关注欧洲语言文学，而忽视非洲语言文学。^④

综上所述，西方语言与本土语言之间的等级关系，是随着殖民权力的合法化过程建构起来的，在多语言并存的环境中，语言的选择、运用与推广常常与殖民统治本身相关，因此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恩古吉决定使用吉库尤语创作的戏剧性转变意味着，他将本土语言文学作为反殖斗争的一种革命性手段。但，等级关系并不限于西方语言与本土语言之间，非洲作家使用的西方语言与正统的宗主国语言同样存在等级的差异，在这一权力中，阿契贝诉诸语言重置策略，利用英语作为通用语的代价对殖民主义进行颠覆。如此，恩古吉与阿契贝的分歧，因反殖和表达非洲文化身份的共同目

① Chinua Achebe, Literature of Celebration, *West Africa*, Vol. 5 (11), 1990, pp. 167—168, in Kofi Anyidoho, Language &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Pan-African Literary Experience,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Vol. 23 (1), 1992, pp. 45—63.

② Alamin Mazrui, Relativism, Universalism, and the Language of African Literature,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Vol. 23 (1), 1992, pp. 65—72.

③ Karin Barber and Graham Furniss, African-Language Writing,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Vol. 37 (3), 2006, pp. 1—14.

④ Daniel p. Kunene, African-Language Literature: Tragedy and Hope,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Vol. 23 (1), 1992, pp. 7—15.

的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弥合。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分析揭示，权力关系网络的中心不是稳固不变的，权力效应的呈现也是动态多样的。在非洲现代文学的生成场域中，在欧洲语言与本土语言构成的对话场域中，语言作为权力关系中的关键要素，不仅代表产生权力效应的可能性，而且是解构殖民权力的重要手段。无论是欧洲语言还是本土语言，都潜藏可用于颠覆权力中心的巨大革命力量。“任何语言都可能成为殖民或解放的工具。”^①

三、殖民文化建制下的非洲本土语言文学

既然欧洲语言与本土语言应共同作为非洲作家表述非洲经验的合法书写媒介，那么两种语言文学就应该在非洲文学的生成过程中享有同等的地位，应在诸多后殖民理论话语的建构中享有同等的关怀，应共同作为萨义德、巴巴、斯皮瓦克批判殖民话语的表述依据。但事实是，自1963年瓦里呼吁真正的非洲文学必须用本土语言书写以来，这场声势浩大的语言问题之争大体以同意使用欧洲语言书写而告终。用欧洲语言，尤其是英语创作的文学在阿契贝等非洲作家与学者的辩护，以及20世纪80~90年代兴起的后殖民理论、解构主义理论阐释的加持下，不仅具有了非洲语言和非洲文学的合法身份，而且在与本土语言文学构成的对话场域中占据了优势地位。本土语言文学因此继续在非洲现代文学的发展中遭遇窘境。尽管本土语言文学生产数量较多，但在学术研究中却处于边缘化地位；某些作品虽被译介为其他文字，但市场需求甚微。20世纪60年代的英联邦批评话语曾经形成一种“非洲文学别无选择，必须用英语书写”的错误意识。后殖民批评既是对英联邦批评的延续，也是对它的颠覆，还是对一种二元的普世模式的推广，其结果是从批评视野中“消除了非洲语言的表达”。^②从宏观上观察后殖民话语中的权力关系，可以看出，后殖民理论承认帝国中心拥有令边缘力量无可逃避的权力，其理论逻辑实际上助长了帝国的权威。即便《逆写帝国》为受殖者解禁，让其在边缘发声，却也是让其只用英语说话。后殖民理论局限于标准英语/地方英语（English/engliscies）的政治伦理话语范式，仅将本土语言作为重塑、改写、挪用英语的反抗策略的来源，独特的非洲表达模式也仅仅沦为反抗话语的背景。对中心的弃用和挪用作为颠覆权力策略，本身无可厚非，但在后殖民批评话语中，本土语言本身及其文学始终未被充分论证。同时后殖民批评普遍忽视的是，用西方语言进行创作的作家自身的主体欲望，因此，有一些非洲作家想接受西方语言作为书写媒介的欲望，并要用它解构殖民霸权的欲望，似乎湮没在对话语争论的众声喧哗中，遑论本土语言作家的创作欲望。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后殖民理论对第三世界本土语言作品的回避，掩盖了一个事实——第一批非洲本土语言文学作品是非洲现代文学重要起源之一。有迹可循的文本显示，非洲本土语言文学的出现年代远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为久远。20世纪的非洲文学并非新近衍生自欧洲文学传统，相反，据现存历史记载，本土语言文学已有5000年传统。^③非洲本土语言的书写形式也早在公元5世纪出现在埃塞俄比亚，斯瓦希里语、豪萨语和富拉尼语等诸多语言早在殖民入侵以前已形成书面文学。^④

^① Alamin Mazrui, Relativism, Universalism, and the Language of African Literature,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Vol. 23 (1), 1992, pp. 65—72.

^② Karin Barber, African-Language Literature and Postcolonial Criticism,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Vol. 26 (4), 1995, pp. 3—30.

^③ Chinweizu Onwuchekwa Jemie, *Voices from Twentieth Century Africa*,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88, pp. viii—xix, in Kofi Anyidoho, Language &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Pan-African Literary Experience,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Vol. 23 (1), 1992, pp. 45—63.

^④ Karin Barber, African-Language Literature and Postcolonial Criticism,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Vol. 26 (4), 1995, pp. 3—30.

本土语言现代文学产生于 20 世纪上半叶，受四个因素影响：传统口头文学、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与殖民文化，在时间上早于用西方语言书写的非洲文学。在西非豪萨地区，伊斯兰教于 14 世纪下半叶传入，随之出现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阿贾米豪萨语，19 世纪初伊斯兰宗教革命时期，产生大量融合传统口头诗歌的阿贾米豪萨语宗教诗歌，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英国殖民入侵以后，对阿贾米豪萨语实施拉丁化，以期压制伊斯兰教义及其文化的影响，并推行一系列文化政策，促进拉丁豪萨语书面文学的形成，由此开启了豪萨语现代文学。最早的豪萨语现代小说诞生于 1933~1934 年殖民地本土文学创作比赛，包括阿布巴卡尔·伊芒 (Abubakar Imam) 的《治愈之水》(Ruwan Bagaja) 等五部作品。^① 在西非约鲁巴地区，第一部小说问世时间更早，为 1928 年出版、由 I. B. 托马斯 (I. B. Thomas) 所作的《色吉罗拉自传》(Itan Emi Segilola)；而图图奥拉的《棕榈酒醉汉》(The Palm-Wine Drinkard) ——这部所谓的在众多非洲文学史中标志“非洲小说”起点的作品，迟至 1952 年在英伦出版。

不可否认的是，非洲本土语言文学，早在西方殖民者入侵之前就已具备悠久的历史。殖民统治时期，宗主国的文化和教育政策的介入，对非洲本土语言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产生了一系列制度性干预。以北尼日利亚的豪萨语文学为例，传教士于 20 世纪上半叶在殖民地推行识字教育，社团中由此产生具有读写能力的“领袖阶层”，并产生第一批使用非洲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20 世纪 30 年代，北尼日利亚殖民当局设立文学局，其职责包括出版本土语言报纸、为本土语言确立拼写规则和举办文学创作比赛。本土语言作家始挪用小说这一外来体裁，将非洲经验与虚构叙述进行杂糅，作品多反映非洲社会的剧烈变革，以及变革中非洲人复杂的道德、价值、观念冲突。本土作家以此建构了殖民地文学话语。拉丁化豪萨语文学曾遭遇已在非洲树立经典书写语言地位的阿拉伯语的阻力和豪萨传统作家的抵触情绪，且缺少创作范本，尽管如此，1933~1934 年间举行的本土语言文学创作比赛为非洲本土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树立了豪萨语当代文学作品风格，也标志着豪萨语文学世俗化的开端。^② 在此期间，豪萨传统作家继续使用阿贾米语或阿拉伯语进行写作，作品多为“非虚构”类的世俗散文，而使用拉丁化豪萨语创作的作家受西方文学影响，“将小说和戏剧等元素融入文学创作之中。文学创作比赛通过鲜明的世俗取向和对传统的书面文学中缺失主题的补充，掀开了豪萨文学崭新的一页，包括罪恶与惩戒、爱情与憎恨等情感话题，以及犯罪、嗜酒、淫秽等社会议题等。主题、情节和欧洲教化下的豪萨小说表征在植根于豪萨伊斯兰教育、道德说教紧密结合下的现实与幻想、充满想象力的世界中发展。”^③ 由此例可看出，非洲本土语言文学受多重因素影响，小说这一舶来文学体裁与本土语言的异质联接，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桥接。

殖民时期的约鲁巴语文学生产经历了大致与豪萨语相似的进程。其书面化可回溯至 19 世纪中期，最早的约鲁巴语—英语双语报纸在圣公会差会的赞助下发行，一部分文化民族主义者也开始对约鲁巴口头文本进行书面修定。20 世纪上半叶出现以法贡瓦为代表的第一代约鲁巴语本土语言作家，这一群体随着约鲁巴语小说的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文学表达形式，亦在不断壮大。其文学生产涵盖历史小说、寓言故事、民俗叙事、现代道德喜剧、现代侦探小说以及反映现代非洲经验的自传叙述。总体而言，作家们的主体性表达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殖民文化建制，同时有些作家使用英语书写的欲望在此建制中被压制。奥拉德德约·奥科德吉 (Oladedjo Okediji) 称自己之所以选择使用约鲁巴

^① 孙晓萌：《西化文学形式背后的民族性——论豪萨语早期五部现代小说》，《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6期，第53~58页。

^② 孙晓萌：《语言与权力：殖民时期豪萨语在北尼日利亚的运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26~139 页。

^③ 孙晓萌：《语言与权力：殖民时期豪萨语在北尼日利亚的运用》，第 136 页。

语写作，是因为 1954 年西部地区文学委员会（the Western Regional Literature Committee）“宣布”找人“用约鲁巴语”写“现实主义”题材小说，而非“森林里的神灵”故事。若非殖民地文学机构的介入，他表示完全有可能选择用英语写作。^① 殖民政府和传教士教育机构培养了约鲁巴人的读写能力和文学创作能力，法贡瓦等作家的作品一经出版，便在小学教学大纲中被指定为虚构作品读物；同时，殖民当局通过举办竞赛激励约鲁巴语创作性书写，但要求以小说形式创作现实主义作品。然而，殖民当局并未对约鲁巴语文学的创作内容与流通方式进行严格控制，这些条件促成了约鲁巴语流行文学的兴起。如卡琳·巴伯所说，约鲁巴语文学作为一种本土能量超出了殖民政府的任何“建议”（proposal）。^② 换言之，殖民时期的约鲁巴语文学创作大爆发蕴含着殖民权力无法掌控的发展潜力。这一流行文化的形成根植于既有的表现体裁，又呈现具有现代性的新样态。它以城市生活为底色，创作者与受众多为半文盲的“中间阶级”（intermediate classes），他们用本土语言创作与阅读，同时渴望学习英语，并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自发成立许多“自助学校”（do it yourself schools），希望能够接受现代教育。本地印发的本土语流行小说、流行音乐、流动剧院、表演诗歌成为再现当下非洲经验的载体。蓬勃兴起的本土媒体提供了现代民族共同体想象的先决条件之一，地方文化的繁荣得以培育出约鲁巴人对自身语言及语言艺术和地方性主题的自信，即一种正当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殖民地的教育系统为约鲁巴人引进了英语文学作品。来自欧美的通俗文学，尤其是侦探故事与惊悚传奇对约鲁巴现代文学创作深刻影响。约鲁巴语作家遂建立起与英语文学既独立又并存的共生关系。由此可见，约鲁巴语文学朝向现代性的发展趋势有力地否定了本土语言文学归属传统而拒斥现代性的断言。

四、本土语言文学及其“去殖民化”实践

总体而言，在殖民语境中发轫的非洲现代本土语言文学并未依循自然发展的规律与路径，其大致脉络投射出种种被殖民话语辖制的曲折印迹。殖民主义客观上推进了本土语言的书面化，以及非洲现代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但殖民文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却是霸权政治的运作结果。本土语言在此霸权统治下或被利用，或被压制，其文学生产也在帝国意识形态的笼罩下被形塑，显示出帝国文化霸权的宰制与增殖效应。即便有些本土语言文学生产受到殖民当局的鼓励，成为赞助体制下的文学，其发展仍无法比肩殖民宗主国语言文学。

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去殖民化”议题几乎涵盖非洲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与文学“去殖民化”成为非洲知识阶层自觉担当的责任。前述语言问题的论争，便是非洲知识精英在文化“去殖民化运动”中画上的浓墨重彩的一笔。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非洲出现了以钦维祖和恩古吉为代表的“拒绝非洲创作之文化融合的力量”，以非洲文化与文学的“去殖民化”为目标，试图回归前殖民时期的语言与文化模式。^③ 但正如语言“去殖民化”遭遇的悖论——选择本土通用语代替殖民语言的困境，殖民主义不可避免地导向文学“杂糅化”，非洲现代文学对西方殖民遗产的处理必定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程。几乎所有的非洲现代文学，都在试图对已发生重组的

^① Karin Barber, African-Language Literature and Postcolonial Criticism,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Vol. 26 (4), 1995, pp. 3—30.

^② Karin Barber, African-Language Literature and Postcolonial Criticism,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Vol. 26 (4), 1995, pp. 3—30.

^③ [澳] 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澳] 格瑞斯·格里菲斯、[澳] 海伦·蒂芬：《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任一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21~123 页。

社会进行叙述，多元文化的并存，必然相互影响、渗透。对于那些强调必须使用本土语言创作的作家而言，“去殖民化”意味着尽可能彻底地摈弃殖民特色，尽管如此，恩古吉的吉库尤语小说也不可能避免的是一种文化杂糅。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坚持语言转向的同时，仍借助翻译手段将其母语作品译成英文——他不得不承认英语词汇量大、受众广的优势。可见，即便他弃用英语写作，要对西方语言与文化做出绝对“非此即彼”的选择也是不可能的。

文学“去殖民化”的矛盾同样见诸本土语言文学批评。本土语言文学是一个开放的概念，总是在历史变迁与异质文化渗透的过程中不断被影响、不断生成变化、不断丰腴充实。丹尼尔·P·库内内曾指出：“随着欧洲语言译本的出现，本土语言作品开始被虹吸进非洲现代文学”。^①应该指出的是，本土语言文学原本就是非洲文学的内在组成部分，何需通过“虹吸”进入非洲文学？丹尼尔·P·库内内这一观点系基于语言的等级结构而做的判断，这往往将本土语言文学的光芒弱化为一种背景和对“主流”文学（使用西方语言创作的非洲文学）的注疏，如此，本土语言文学恐怕难从殖民语境的宰制阴影中脱身。殖民时期西方文化的渗透令非洲人接受其自身文化与语言的弱势地位，奠定了西方批评话语的基本态度，并形成刻板的本土语言文学/英、法、葡语文学的二分对立范式。结果，造成本土批评话语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一范式的照搬模仿。以尚塔尔·扎布斯（Chantal Zabus）的批评实践为例，她在参与盛大的“去殖民化”进程中不自觉地落入了这个陷阱。她认为在约鲁巴文学的连续体中出现了一种怪异的缺失环节（missing link），^②即在约鲁巴语故事叙述大师法贡瓦和双重遗产“阐释者”索因卡之间的文学叙事存在断裂。她构建这一意象的依据是，索因卡的英语文学世界是从约鲁巴口传民间文学世界进化而来的，而法贡瓦的本土语言世界仍停留在传统阶段。在她看来，阿莫斯·图图奥拉通过使用不合乎标准英语规范的地方英语（english），桥接、跨越了传统的、口头的本土语言文学世界和现代的、书面的英语文学世界，这不失为填补缺失环节的解决之道。这种策略本身无可指责，但尚塔尔·扎布斯的批评模式在索因卡与法贡瓦之间建构了一种依进化过程形成的等级结构，并且失之于将现代性单一地划归于欧洲语言形式之列。在对法贡瓦和索因卡进行两极化讨论时，她忽视了二者同是双重/多重文化遗产的阐释者，同是文化中间人（cultural broker），二者均从口头与书面资源中提取创作元素，二者均致力于尼日利亚殖民一后独立转型期的文学话语建构。非洲文学与文化的“去殖民化”，绝不在乎对作家、文本作简约化的传统/现代、口头/书面和本土语言/西方语言的区分，并在两极之间进行选择。

从本质上而言，非洲文学的“去殖民化”，是本土作家与批评家为摆脱殖民霸权影响、建构非洲文化与文学主体性所做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是用西方语言书写的非洲文学，还是用本土语言书写的文学，其共同目的在于，建构一个区别于其他文学的、独立的非洲文学实体，并形成自身的话语体系。在金字塔等级不断趋平的后殖民语境中，本土语言文学与众多地方英、法、葡语文学之间的层级差异不断趋于平等，而批评话语的任务应是，予以本土语言文学同等的评述，充分挖掘其内在的、与地方英、法、葡语同等的解构潜力与政治属性，同时对非洲文学的内在多样性给予充分支持。

如果说殖民化进程伊始就伴随着第三世界国家与人民的“去殖民化”努力，那么本土语言作家

① Daniel P. Kunene, African-Language Literature: Tragedy and Hope,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Vol. 23 (1), 1992, pp. 7—15.

② Chantal Zabus, *The African Palimpsest: Indigenization of Language in the West African Europhone Novel*, Amsterdam and Atlanta, GA: Rodopi, 1991, in Karin Barber, African-Language Literature and Postcolonial Criticism,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Vol. 26 (4), 1995, pp. 3—30.

跟随历史律动、与现代文学融合的同时又保留传统的写作实践就是参与“去殖民化”进程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力量。恩古吉弃用英语的政治策略既表现于他对“新一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的反抗，亦表现于他参与“去殖民化”进程的努力。就作家介入社会历史发展而言，恩古吉的写作语言转向代表着非洲作家在“去殖民化”进程中的积极尝试，这一点无论如何也是值得肯定的。不论是使用西方语言书写，还是使用本土语言书写，作家摆脱殖民影响、努力获得完全自决与独立的热望永远具有正当性。

五、结语

殖民主义通过文化建制确立霸权话语体系及其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本土语言文学的自然发展。而后殖民理论从未摆脱西方话语范式的束缚，使本土语言文学逡巡于批评话语之外。但非洲本土语言文学发展到现代，实现了书面与口传形式的交融，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已然打破西方中心预设的诸多二元对立，朝向多元发展。非洲现代文学之生成，是本土语言文学与使用西方语言书写的文学经过殖民主义塑形后，在后殖民语境中相互激荡影响、相互补充渗透的结果，二者共同成为再现非洲经验和进行民族共同体想象的形式。在非洲各国的“去殖民化”进程中，非洲本土语言与文学作为积极的政治因素，与使用西方语言书写的文学一起参与了重构非洲身份与主体性的集体表述。

（责任编辑：权达）

Language Debate in Modern African Literature: A Reflection 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Value of African Native Language Literature

Sun Xiaomeng Hu Yan

Abstract: The language problems in African literary creation have been long-standing, and this can be ascribed to the differentiation language policies carried out by European colonists in direct or indirect ruling. Therefore, the initi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frican native language literature was largely shaped by the language and cultural policies issued by colonial authorities, and by the intervention of their agents. Postcolonial theories have averted African native language literature, making it fail to obtain its proper position in 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 However, the inherent political attribute of Afric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makes it possible for African writers, including those writing in native languages, to subvert colonial power and authority. This paper is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African literature results from the mutual penetr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literature in African native languages and that in western languages in the post-colonial context. Moreover, in the course of “decolonization” in Africa, both kinds of literature, as active political factors, have been engaging in the collective presentation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African identity and subjectivity.

Keywords: native language literature; language problems; colonialism; “decolonization”